

非物质文化，与生俱来，与民族同在

——访著名民俗学家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



花鼓灯踩街·端午节——西塞神舟·木卡姆

采访乌丙安先生的稿子，整理之后长达2万余字，这当然要感谢年届80岁的乌丙安先生不辞劳苦，对我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更要感谢我们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说不尽、道不完。若能将访谈悉数转录于此，则能更深刻地感受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她的价值，她的美丽与她的魅力，以及今天她所面临的局面。但篇幅有限，我们只能摘录部分在此，以飨读者。

记者：为什么近几年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如此重视？

乌丙安（以下简称乌）：我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。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国情使然，我们自身需要非物质遗产，国家机体内部呼唤她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国际上的约束和要求。

我国改革开放以后，首先要大力发展落后的经济，邓小平提出要以抓经济为主。经济怎么才能现代化？闭关锁国，关着门搞经济建设，被我们的历史证明是失败的，经济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所以国家迎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突变，是真正的飞跃。这种经济为中心一直延续至今。重要的标志是我国加入WTO。但随着经济的飞跃，我们的文化也发生着突变：孩子们从看古老的连环画小人书，一次性过渡到瞧动漫；从唱老歌儿，突然成了现代摇滚迷；流行乐坛天天在变化，从几个流行乐手难以想象地变到“超女”。这种文化突变，跟我们国家经济现代化应该说是同步的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，就有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。世界新动态冲击我们旧的经济体制，我们不留恋，它把旧的经济体制打得落花流水，这是我希望的，我们不止要温饱，更要过好日子。但

对我们文化体系的冲击我们不得不反思，不得不采取行动。中国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中，积蓄了多少好东西，她与我们祖辈辈的生命紧密地结合，同我们血脉中的基因难以割舍，她是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。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就扔掉，我们也扔不掉。极左了那么多年，你用“封建迷信”打击她多少年，民间还是那样唱歌，还是那样跳舞，还在那样祭祀！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世界各国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，非洲的、拉美的，多少国家元首出面，在广场上聚集几十万人的大会，谴责西方垃圾文化的入侵，强行用文化产业订货，迫使经济上弱小、文化上却有自我独特传承脉络的国家接受西方强势文化。我们呢，也需要采取些行动吧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文化认同，和文化认同作为根基的民族自尊、民族自信、民族情感、民族凝聚力的问题。

我们文化的延续曾经被自己破坏过，这种灭顶之灾使得文化的延续出现了断裂，几代人不认识自己的文化，不了解自己的文明，随着西方洪流的涌入，也就很容易产生文化的自轻、自贱、自卑、自弃。

每年我国要派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民族交响乐。打着民族乐团的称号，偏偏抛弃自己延续了几千年的，既有其科学合理，又有深厚的历史沿革内涵的演出方式，改用欧洲的格局。第一，中国音乐演奏自古以来，没有过指挥，但是他们硬要安一个指挥。第二，舞台上所有的乐器配置是西方化的。二胡站在小提琴的位置，前面中间有指挥台，竹管乐都在人家的管乐位置，鼓呢很可怜，在后面的角落，该打鼓时候点一下。他们不知道吗？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队，从来是以鼓为中心的，鼓要在最前面。延续到京剧和

很多地方戏曲也是。外国音乐家来了，闭着眼睛听，找咱们乐队中间指挥的是谁，后来听出来了，是打鼓板的那个，他就明白了。但看了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，反而搞不明白，“奇怪了，中国民族乐队的配置怎么出奇地跟我们相似？”就把人家弄迷糊了。说起我们鼓的文化内涵呢，那更是历史悠远。我们的鼓是用来祭祀的，上面绘有祖先的形象，像燕子身上插了很多羽毛。“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”。那只黑色的小鸟，就是商代的祖先。说的是名叫简狄的部落首长的女儿，和她的姐姐在窗子下往外看呢，飞来只黑色小鸟下了个小蛋儿就走了，她们两个抢鸟蛋。小妹妹简狄抢着了，吞吃下去就怀了孕，生下孩子是为商代先祖。这个神话在《史记》、《诗经》里都有描述。所以把鸟、燕子，绘在鼓上来祭祀，出土文物证实，从商代以来就如此。故宫和沈阳故宫各存有一个这样的鼓，不过上面放的是凤凰——唐代以来就变成凤凰了。清朝入关引用了汉人的习俗，说清代祖先是黑色神鸟的后代：三个仙女在天上行走，一个黑色的鸟鸣来红果——长白山盛产山楂，就是红果。三个姐妹一抢，结果最小的女儿佛库伦抢到吞下，怀孕了，生下来个孩子叫爱新觉罗·布库里雍顺。他被放在小船里顺流飘下，下游的三个部落正在打仗，看到河上飘过来一个孩子，是个男孩儿，就都停了战，将孩子奉为三个部落的首领，三个部落从此合一。这个神话，是爱新觉罗·努尔哈赤起兵打明朝的很重要的支点。所以满人既不打乌鸦也不打喜鹊，避讳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的文化有自己的脉络。我们自己的古老的阵势，在“二十五史”的“乐制”里面，都有记载。如果我们在欧洲演出，不用人家的东西，而按照记载，哪里摆什么写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不行吗？一定要用欧式的吗？

自己的文化不要了，转而去跟风别人的文化，结果是东施效颦，为人耻笑。中国典型的美女，是特有的蒙古人种那种丹凤眼，两眼角有点倾斜，你把它硬割成双眼皮，也成不了欧式的眼睛，因为欧式眼内角和眼外角是平行的。中国人很喜欢过洋节，但是洋节过得很糟糕。我就说了，中国这个国家，是圣诞节里惟一圣诞老人不来的地方。圣诞节人家又名平安夜，安静极了。孩子们得赶快回家，他们知道北极那里，圣诞老人已经出发了，红鼻子小鹿鲁道夫驾的车子已经“铃儿响叮当”了，你不再睡觉，礼物怎么送给你？所以，他们在临睡前，把圣诞老人给的装礼物的袜子挂在床头，安安静静地睡去，期待着圣诞老人悄悄地从烟囱、壁炉钻进来。可是中国的平安夜，最不平安，抢抢抢吃，整个步行街上人山人海。复活节表示对耶稣的崇拜，要喝红酒——那是耶稣的血，要吃圣饼——那是耶稣的肉，是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让他的血注入我的身躯，保佑我。过人家的节，却不懂得内涵，搞得一塌糊涂。

一个民族，连自己也无法认同自己，人家怎么可能认同你？你丢了自己的文化身份，别人还怎么识别你？中国西藏的踢踏舞，以踏为主，踢为次，是世界三大踢踏舞流派之一，很有特色，而我们非要在里面加上一段爱尔兰踢踏舞，外国导演看了都哭了，完全没有自我。我在德国讲学几年，感受很深。中国留学生很可怜，问《红楼梦》，没读过，只

看过电视剧；问什么什么都不知道；那我问他德国的东西，他也很无知。而人家德国的学生呢？说背海涅就背海涅，让背歌德就背歌德。你老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这是民族的悲哀。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做这个工作，将来我们可以完全被人所淹没，子孙会骂我们。

第二个，不仅是我们自身非常需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国际上也有约束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召唤，从保护自然遗产、文化遗产，进展到保护非物质遗产，也就是保护各民族最基本的大众文化，而不是精英文化，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，原真性、原生性文化。

记者：您这么说，我有点模糊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界限了。好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就是保护文化的意义。

乌：大文化里面还有物质文化呀，天坛就是物质文化，天坛祭天就是非物质文化。还有一些就是文化层面的。比如孝悌忠信，孝顺不孝顺，清廉不清廉，爱国不爱国，这是以观念来表现的。非物质文化以物质做载体，所展示出来的那些非物质部分，它本身有表现形态。

记者：您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现阶段，对我国的文化建设，或者别的更大的领域起到什么作用？

乌：我们保护一种活态文化元素，能够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巨大资源，可以从这里面创造出为世界所需要，为子孙后代所需要的东西。比如我们有些艺术家，从原声态艺术中找到灵感，作品跟现代也接轨。非物质遗产是一种资源，是我们创新的资源。

记者：保护给一些人的感觉是保守、守旧，是否同创新相矛盾，或者说，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？

乌：有了记忆，意味着今后的文化创新才有自己的根基。人类离不开精神生活。把自己的精神生活扔掉，完全过人家的精神生活，何谈“新”？

有媒体问，难道您还希望用磕头、抱拳来过年吗？我说没有啊，到春节我一个晚上要发四五十个短信啊，“拜”年元素没变，变的只是“拜”的方式而已。随着时代变化，人们自己慢慢会变，不是让大家固守，都不变。但是活态的资源，你也要留到2千年后，就是给大家看。带有一种文化记忆，带有表演性。我们要保护的是，健康的，有利于今天文化发展的，有利于激励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记者：您谈到某些地方滥用非物质遗产，把它功利化，和经济效益挂钩。为什么会如此？这对非物质遗产保护会有什么不利影响。在保护过程中，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？

乌：我们担心的是，地方的保护不在意非物质文化的存活，只在意拿这个好不好卖钱，卖多少钱，结果急转直下。我们的保护，本来就是要投入，不是要赚钱的。非物质文化后继乏人，你封个大号给人家，名字很好听，叫做“传承人”，可谁养活他呀？收不到徒弟，有徒弟也不愿意学。既



民间傩舞：“我们用封建迷信打压了她多少年，民间还是这样唱，这样跳，这样祭祀。”

然不愿意学，那国家就得给鼓励政策，让有志者来。韩国、日本就是这样子。有些文化人对市场化很热衷，他们说了，保护不就是为赚钱，为了立即变成文化产业吗？我说，在我们联合国的文件上，绝对没有这一条，保护就是保护，保护本身就是价值。我们有人强调，“还有用没有？没有用的，死的都不要了”。可日本、韩国不是这样，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，人家要活态的传统文化，让孩子们有文化认同，要把文化史牢牢记住。

我看到很多老艺人被旅游局拉去表演，从化妆到动作，都是导演导出来的。这是完全的破坏。旅游局可以表演这个，但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保护。有人说，我们是在创新，是更好的保护，因为我们再不开发利用，与时俱进，那些非物质文化就死掉了。我认为，把传统拿来尽快创新，而未加保护，就是“建设性破坏”。保护一定得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，尊重他们自己的再生。

记者：从很早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学者重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并且在民间的考察中，与其不期而遇。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与其接触的经历？

乌丙安：我生长在草原上，在喇嘛庙里学习，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呼麦。草原对于蒙古人的成长，一直

是一种艺术环境，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，艺术门类，早跟生态环境联系起来。长调作为蒙古族的歌，发声法非常独特。它产生在草原那种环境，才能有那种悠扬、辽阔的感觉。通过我自己的体验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，与生俱来，与人共存。像我们蒙古族长调，没有人教的呀，从小大家就冲着草原，冲着蓝天白云唱。

记者：有没有那种人群，他们不愿意作为被保护的對象，不愿意守着传统过生活，因为生产方式变了，他们也要享受现代化？会不会有这种冲突？

乌丙安：你必须严格了解，这个族群对自己的文化是采取保护的心态还是抛弃的心态？他所以要抛弃的，是他的文化还是别的什么？

这次温总理去日本访问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团唱侗族大歌，震动了日本民众。这个消息让侗族族群很是振奋。起码在当地，小姑娘说起自己是三江侗寨的，自己唱的歌外国友人很爱听，就有种自豪感。她就愿意继续学自己民族的歌曲，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饰出来。而如果当地经济再跟上来，她为什么非要跑出来，在你这儿卖唱，端盘子打工？

记者：您也认为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很重要，为什么？

乌丙安：他们很多做法非常好，而且实践证明是先进的，实用的。其实我们给工作者发的文件的附录里，都有对于日本韩国经验的介绍，各省都有。很多人不看。他说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样子。有的国家实行文化赎买政策，比如狮子舞每年必须必招四个学生，学生国家给钱，师傅也是国家给钱。他们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一般人。日本的明治维新主张全盘西化，最后导致日本军国主义产生。他们的保护从1950年就开始了，要求保护的，恰恰是明治维新以前，江户时代、幕府时代原声态的东西。他们保护得很好，日本大学生可以到夜总会跳舞，可以蹦迪，可以染黄头发，但是到了自己传统的节日，他们要把发色重新染回来，穿上和服去跳日本舞，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很尊重。我们像这样兼收并蓄多好。

记者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，还是面临着严峻形式的。

乌丙安：我们的老艺人，今天都进入耄耋之年，他们还镇守着他们的艺术免于失传。但是我們也需要尽快采取措施来挽回。我80年代的时候做过剧种调查，那时候我统计的全国还有三四百个剧种，如今搜集净了也不过100多个。很多种群没了。令人痛心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很宝贵的财富，对一个民族来讲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必须做点实事儿。

记者：谢谢您接受《艺术评论》的采访。